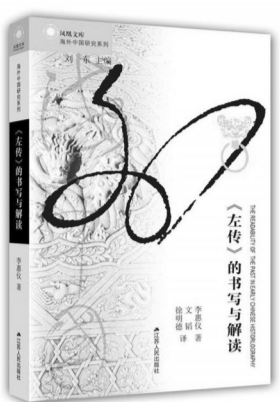


史与思



《《左传》的书写与解读》, [美]李惠仪著,文韬、徐明德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11月第一版,56.00元

在大多数历史书写中,历史事实与价值诠释之间,往往存在着难以消解的拮据之处。一方面,对历史事实本身的铺陈和考证,固然足以让我们窥视到部分的真相,但要是缺少了价值评判的介入,零散的历史事实很难得以串联起来,从而让我们看到历史内在的来龙去脉。然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是片面地强调价值诠释,将历史事实完全作为挪用的对象,随意进行阐释,那么历史也就极有可能在这种任意解读之下,沦为政治冲突和思想冲突的“婢女”。

历史书写的这种困境,几乎笼罩在所有的历史学作品中。如何应

对这种写作困境?如果价值诠释逾越了历史事实的范围,那么我们该如何让历史“回归”?而要是历史事实的细究最终带来了价值诠释的“干涸”,那么如何重新开掘价值诠释的“源头活水”呢?换言之,如何在历史事实与价值诠释之间维持某种有机的平衡,构成了历史书写的真正难题之一。

从这种历史写作困境的角度来看,近期翻译出版的《《左传》的书写与解读》(The Readability of the Pas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虽然是关于《左传》的专题研究,但是其中的部分探讨,恰可以为我们理解相关问题,提供富有启发性的视角。

该书的作者是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李惠仪,她的另一个身份则是《左传》最新英译本的译者。她与杜润德(Stephen Durand)、史嘉柏(David Schaberg)重译的《左传》,于去年在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或许是缘于英译《左传》的关系,在这本书中,李惠仪展现了她对《左传》事无巨细般的熟稔程度,以一种贯通性的论述,有效地组织起本纷繁复杂的《左传》中的历史叙事。

不过,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李惠

礼崩乐坏与《左传》的历史叙事

■王 鸿

仪在此书中最大的创新之处,并不在于她对《左传》历史事实的考订,而在于她将《左传》视为可资探讨的“文本”,从中理解《左传》是如何阐述春秋时代的历史事实,并追问这种阐释本身是否存在着的内在冲突和张力。在这种新视角下,她不再追究以往困扰《左传》研究者的难题,诸如《左传》的作者、《左传》与《春秋》的关系等等,而是考察《左传》所呈现的历史事实与所试图传递的价值诠释之间的冲突。用作者自己话说来,她所试图考察的重要问题,即是《左传》中“标举秩序的修辞与这些充斥冲突、破坏、欺诈、奸邪的记录,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左传》以道德体系自然起来的修辞碎块,又是如何驾驭其中权力关系的书写?”

在作者看来,虽然同为《春秋》三传,但《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左传》强调事件,其叙事熔铸“经”所代表的恒久原则和“史”所包含的时序变化。而《公羊》和《谷梁》则在阐述中避开了细节的讲述,表现了“经”和“史”的分离。这也就是说,《左传》一方面所呈现的是一套道德和秩序的准则,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不忽视历史事实本身的变迁。《左传》所试图实现的,恰恰就是“经”与“史”

之间的互动,熔历史事实与价值诠释于一炉。

就“经”的层面而言,《左传》大体上标举周初的道德与政治秩序,体现了“尊周从周”的精神。《左传》通过“礼”“义”“忠”“信”“德”等词汇,以及对占卜、梦境、天象、鬼神、上帝、音阶、言谈举止等方面的阐释,构筑了一套解释性框架,“把世界看成一个个复杂而井然有序的体系,在这种世界观之下,每个事物都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既表现为社会政治、礼仪、宇宙秩序的相互对应,也表现为一些玄奥和广泛性的对应关系。

不过,《左传》并非是纯粹的道德说教,除了“经”的层面外,还包括“史”的层面,从而呈现出“经”与“史”的杂糅。用李惠仪颇具概括性的话来谈,“我们不难在《左传》里发现它精妙地融合了看穿现实厉害者的严苛计算和理想化的道德说教;既把往事和先前的文本视为当前行为的指导,又充满着呼唤变革、赞赏掌管更大权力的议论,又展现了反对者的立场;对于战争既有军事战略上的考虑,又存在着道德化、仪式化的视角”。

然而,在“经”与“史”之间,在价

值诠释与历史事实之间,李惠仪也敏锐地注意到,《左传》其实明显地倾向于前者,“试图把规律套用到流变的事情上”,从而呈现出某种程度上拮据之处。《左传》所书写的世界,恰恰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是一个王道不再、霸道横行的时代,原有的价值体系面临着崩解的境地。如果说原有的周室的权威建立在礼仪秩序的内在连贯性上,那么层出不穷的霸主,则恰恰以权力挑战了礼仪的有效性。如何再以原有的价值系统解释变化了的历史事实,构成了内在于《左传》的“解释的焦虑”。

在李惠仪的分析中,这种“解释的焦虑”在《左传》的后半部分逐渐增加。如果说在霸主挑战圣王之初,如齐桓公、晋文公时代,权力与礼仪之间仍然有所平衡,仍可以用原有的价值系统进行勉强解释,那么在霸主横行的后期,权力与礼仪之间的平衡则完全被打破,价值诠释与历史事实之间的裂缝,已然无法填补。在分析这段历史时,李惠仪便坦言,“礼仪本来可以为野蛮的战争披上文明的伪装,但连礼仪在这里也因各人的阴谋而被滥用、被曲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赋予历史事实以合理的解释,如何重新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行,既构成了历史

局中人的困境,也构成了《左传》书写的难题。

对于这种难题,李惠仪注意到《左传》后半部分中对于“尊周从周”的叙事的变化。“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更频繁地强调起源。这里所谓的起源包括信息架构下国家的建立,也包括我们称为‘神话时代’事物的根源,尽管在《左传》里这两个框架的界线其实非常模糊,甚至没有多大意义。其次,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人们有空间去争辩和操纵他们对过去的诠释。保守派因为衰亡的预想而援引周初的理想秩序,以此作为诠释的模式,而改革派则假设过去有不同的发展方向,藉此解释和改变当前的状况。”

很难说《左传》彻底解决了礼崩乐坏的变动时代里的历史事实与价值诠释之间的困境,但在对《左传》的文本分析中,如李惠仪所指出的,我们可以发现,“古人可以利用修辞来形塑往事,藉此达成不同的目的。同样地,解读的规则也并非毋庸置疑,人们可以以争辩和利用解读的规则”。如果在礼崩乐坏的时代里,历史的发展注定了单一价值诠释的失效,那么《左传》提醒我们,有必要发掘对于往事的多种解释,并从中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多重可能性。

读书笔记

《左传》对莘地降神的记载与春秋时代的天人关系

■高铂宁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和《国语·周语》均留下了一段相似的记录:公元前662年七月,“有神降于莘”并且“居莘六月”。但对于此事的具体过程并未留下确切的描述;查阅相关注疏,只有杜预如此注道:“有神声以接人”,孔颖达解释为:“神者,气也,当在人上,今下接人,故称降也”。就“降神”在古代汉语中的一般用法来推断,它所记录的是上古时代巫师受神灵附体一类的事件。

《说文》将“巫”字解释为“以舞降神者也”。详细说来,莘地降神是指莘地的某个巫师经由某些仪式陷入了一种宗教的迷狂,在“神灵附体”时接受了魏公的祭祀,甚至代表神灵发布谕旨,“赐之(指魏国)土田”,试图借由超自然力量对现实政治施加影响。就文本而言,我们无法确证降神附体之事一定是风闻捏造,也可能是巫者被信仰影响而进入了某种特殊的精神状态而已;又因为《左传》的记载经由后人编辑整理,而非全然的事件堆砌,我们也需分析作者对此的书写是否传达了额外的精神意涵。

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时,针对《左传》的批评是“其失也巫”。的确,包括莘地降神在内,《左

传》全书出现了不少鬼神之说:晋景公的病灶化作孩童交谈,声伯落泪成珠玉的诡异梦境,天象对人间政治的一次又一次投射,占卜结果预言了无数的人生结局……但是,我们很少读到对占筮、卜梦等的具体操作过程的描写,提及鬼神之后,叙述的重点也往往更多着墨于对已出现的灵异现象的推理。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针对《左传》的预期受众来说,此类祭祀、占卜与降神等的流程已经成为了生活常识,无需多言;但更重要的还是《左传》的作者对“神”“民”与“天道”的认知在选材时起到了作用。

在内史过和史墨各自的答案里,我们能读出,在这两位史官的观念中,“神”是依然存在着的,并且和诸侯的治理有着脱不开的关系:“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降神以兴,亦有以亡”,“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等等。但“神”的意志已经不再完全等同于天理的运行,它的明辨与观照最终总要“依人而行”,而反其道而行之、凭借占卜等“神”之力的国家只会招来衰败乃至灭国。“神”与“民”的关系,诸侯的统治与神灵的福佑的关系,在《左传》的记载中都存在着微妙的矛盾

与自洽。

在很多段落里,我们可以看到《左传》既承认存在着某些超自然现象,又能以“神灵降临”以外的框架来解释它。当然,自我排斥在记述中也依旧可见。春秋毕竟是久远的古代,当时的华夏民族与今日的中国人是以迥然不同的目光看待世界的。尽管思辨的发展培育出了士人的理性,但是内心深处终究是受传统浸染,“神”的重要性又不必言喻。但在处理这些关系时,《左传》的书写试图把“降神”这一类超自然现象看作所有历史记录中的惯常的一部分,借由此,神明的赐福向“依人而行”进行了过渡。但《左传》也并没有完全否定“神”的存在,而是通过这类故事曲折地告诉读者文本之中有着新的逻辑:“神异”只是一故事引来自光的外表,真正的核心实际上属于“人”。史官——无论是管诸侯间的史官抑或记录此事的史官——不再完全相信天降神意的正确性,而是思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思索“神的意愿”和“国君的德行”之间的差异,最后得出了结论:“德行”比“神意”更加重要。史墨对“有神降于莘”的解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感叹道:“魏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

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魏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他依然把“神”视作全然的神,但世的重心已经挪到了“民”字上,这显然是春秋时期天命观的绝大进步了。

这一则问答的记载在《左传》和《国语》中略有区别,不过两者的重点还是一致的:指出“魏国必亡”,并对魏国开展祭祀以求神赐土田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在此事发生之前,魏国的国君已经是“贪冒、辟邪、淫佚、荒怠、粗秽、暴虐”之君,国内政治昏乱,刑法严峻,百姓生活难以维继。而即使采信“降神”之说,即此事是真正与某种宗教或祖宗祭祀有关,那么也不能视作是鬼神降福,反而是国之将亡的恶兆——如果神明的伟力可以明察一国之政,本就不该副衰败之象的魏国不可能凭借一次祥瑞改变国运;魏国国君派遣官员进行的丰盛祭祀更是毫无作用,即使天神答应下来了赐土田的请求,也不过是“将亡,听于神”和“虐而听于神”的恶兆罢了。

诚如内史过和史墨所判断,就在四年之后,魏国被晋所灭。是“神”真有如此强力能灭掉一国,还是二人皆有预言国际形势变化的能耐?不如说是因为《左传》作者已经

知晓了历史的结局,而借历史人物之口进行预言,事后的“预言”自然无不准确。这种解释大概会让故事失去其神秘色彩,但更为合理;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依然是,《左传》为何要如此行文?前人因此而批评它“不专人事”者有之,但这种写法未尝没有达成历史与文学的统一性。

总体而言,自中国有史以来,占卜、降神之事的重要程度呈现下降趋势。夏商时期,卜筮还是上层阶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尊奉备至,祀戎大事以其为指导;统治者的合法性来自于天命,并不以其人的治理能力为改变。《史记》记载,商纣王曾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继承了上一代统治者的天命,便自以为高枕无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知识结构日益完善,贤人能臣对所请天命的态度也在起变化。周王的势力随之提出了天命交替,为灭商的正义性张目。在《左传》中,推动历史发展的终归不是卜辞或者某一个诡异的象征;而是国君与士大夫针锋相对的问答中所展现的政治智慧。华夏历史,也在这一系列的交锋中,从神的政治走向了人的政治。尽管“神”也被视作一个关键因素,但施政重点走向了人民。而在《左传》作者看来,此时的魏公只看

重神的祭祀,未知民之所在,于是招致了国运倾覆。

《左传》通过用“重民”思想对鬼神之事进行阐释,既束缚了诸侯等统治阶级对自身德行的要求,也点出了百姓苦乐应被诸侯与士人所重视——尽管原因并非出于现代人所提倡的人文关怀,但相对于前人,仍然不失为一种提升。同时,新的天人关系也暗合了作者的施政理念:面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作者试图告诉读者,所谓神异现象、预言卜筮并不能决定历史进程,它们是国君未能尽职尽责、导致百姓民生凋敝而引起的。因此,为了规避“凶兆”,需要做的不是祭祀神灵以求庇佑,而是让国君听取劝谏、励精图治。这套逻辑固然不符合现代人对世界的科学认知,但已经是深受祭祀文化影响的史官在探究天人关系的尝试中能推出的最佳结果。《左传》中的天人关系着重于“人”,更多地观照现实社会的兴亡盛衰、民生苦乐,认为“天”尽管掌握着历史进程、祸福吉凶,但它们的判断标准来自于人间的道德准则,赐福于政治清明的国运而降祸给政治腐败的国运,故而人自己可以决定自己和国家的命运,不必服从灾异或祥瑞的支配。

中国哲学史和科学史之间的“架桥人”

——读《周瀚光文集》

■吾敬东



《周瀚光文集》(5册),周瀚光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6月第一版,600.00元

记得第一次为周瀚光教授的著作写书评还是在1993年,当时周瀚光教授的《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研究》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那是一本约10万字的小册子,我曾为之写了一篇书评:《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研究读后》,发表在《哲学研究》1993年第4期上。如今过去了25年,《周瀚光文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近期隆重推出,只是这次已是巍巍四卷五册,洋洋150多万字。装帧精美,已非当年那本小册子可比。我拿到如此精美的书自喜不自禁,爱不释手,当然,其中的内容更是我感兴趣的,所以很愿意为周瀚光教授的这套新著再写一个书评。不过我不打算局限于谈书,有些回顾或许同样有意义。

我与周瀚光教授结识要追溯到1980年代,当时我们都关心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周瀚光教授原本是复旦大学

哲学系严北溟先生的弟子,那时已到华东师大工作,其所关注的就是上述问题。而我则于1985年入华东师大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也是上述这个问题。说到这里,就必须提到我的博士生导师冯契先生,因为他一向关注自然科学对哲学的影响。冯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一书中特别强调指出:“有一种流行的见解,中国哲学家着重讲做人,西方哲学家着重讲求知。由于中国人较多地讲道德实践和修养,而较少讲知识,所以中国哲学中认识论不占重要地位,或者说认识论不发达。”对这样一种见解,冯契先生提问道:“这种说法对不对?值得研究。”毫无疑问,冯契先生上述充满智慧的洞见和发人深思的提问对周瀚光教授和我日后的工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还有时任华东师大校长的袁运开先生。袁先生研究物理学史并十分关注中国古代的物理学思想,他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

1987年和1990年,在周瀚光教授的组织下,华东师大召开了两次全国性会议,分别是“中国科学思想史”研讨会和“传统思想与科学技术”研讨会,由此周瀚光教授在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领域已崭露头角。1990年代,上海科学史和科学思想史研究十分活跃热闹,在全国

也颇有影响,我也正是在那段时间结识到更多的同道,包括李申教授、江晓原教授等。

今天,尽管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仍属于“小众”甚至“极小众”的研究问题,但的确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这一关系或问题的重要性,这自然是跟周瀚光、李申等教授的卓越工作分不开的。而对周瀚光教授而言,从1987年第一次组织全国性科学思想史会议开始,至今更是已有整整30年,这期间究竟付出了多少艰辛或许只有他自己最为清楚。就我所知,他就曾因太过劳累而心肌梗塞并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回首往事,令人生出入无限感慨!也因此,这次凝聚了周瀚光教授极大心血的这套《文集》出版,真是可喜可贺!这是对他一直以来在中国科学思想史领域坚持不懈努力的最好回报,并且也再一次体现了辛勤耕耘与丰盛收获之间的完美关系!并且我还想说的是,这套《文集》也完美体现了周瀚光教授一贯的行事风格,那就是思维缜密、滴水不漏,可以说事无巨细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现在,这套四卷五册的《文集》就摊开在我面前。第一卷:《中国科学哲学思想探源》,共上下两册;第二卷:《中国科学哲学思想探源》;第

三卷:《中国管理哲学思想探源》;第四卷:《科学史与科技古籍研究》。通观这些卷册的名称,就不难看出“科学”一词贯穿始终。这也难怪周瀚光教授在前言中所说的,在许多学界朋友的眼中,他是一个科技史工作者,并且他自己也常常以科技史工作者自居。当然,周瀚光教授又特别指出,这只是他一个方面的“身份”,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同时也是一个哲学史工作者。为此,周瀚光教授对自己有一个专门的“定位”,即称自己是一个游走于科技史与哲学史这两个学科之间的“两栖人”,或者更愿意称自己是一个在科技史与哲学史这两个领域之间架设桥梁的“架桥人”。周瀚光教授的这个说明是非常重要的,以我多年来对周瀚光教授工作的了解,我清楚地知道,他绝不是从事纯粹的科学史研究,而是从事历史上科学与哲学关系的研究,或者说是科学与哲学关系史的研究。

当然,这也不是说周瀚光教授的所有工作在我心目中具有同等的地位。如果要让我选择重点的话,我更愿意推荐他这套《文集》中的第一卷《中国科学哲学思想探源》和第二卷《中国科学哲学思想探源》。

《中国科学哲学思想探源》由上下两册组成。其中第一编《中国古

代科学方法研究》可以说是周瀚光教授本人的奠基之作,也是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如前所说,早在25年前我已经为其写过书评。其中列举中国古代科学方法三十六则,精湛的把握,高度的概括,一览众山小,至今读来仍惊喜有余,我也能回想起当年周瀚光教授的意气逼人。其他让我感兴趣的是第三编《先秦数学与诸子哲学》、第四编《道家道教与古代科技的发展》、第五编《中国佛教与古代科技的发展》。这不仅是因为在一些问题上周瀚光教授能想前人所未想,发前人所未发,而且还在于对儒、释、道与知识关系的通盘“安排”。

而《中国科学哲学思想探源》则是重点中的重点,包括其中第八编《先秦数学与诸子哲学》、第九编《刘徽评传》、第十编《李冶评传》等都是周瀚光教授的力作。这乃是因为数学史是周瀚光教授的专长,在有关中国科学史、中国科学思想史、中国古代科学与哲学关系的研究中,数学哲学思想也一直是其侧重点。除了《先秦数学与诸子哲学》一书在国内出版二十年后受到韩国学者的青睐而被翻译成韩文出版,凸显了其国际性的学术价值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刘徽评传》中对刘徽科学思想“极限”“重算”“求理”等方面的概括,《李冶评传》中对李冶科学思

想“数理可知”“道技统一”“博而后精”等六方面的概括,这些都反映了周瀚光教授对中国古代数学思想及其与哲学关系的透彻把握。就我所知,在中国哲学史界,并无他人做过如此专门的工作。

事实上,如果读者留意的话就会发现,正是在这两卷中,周瀚光教授向我们展示了他与那些名家、大师之间的联系,包括李约瑟、钱学森、冯契、胡道静、席文、张岱年、吴文俊、席泽宗等,其中的一些名字是如此闪亮!

往事如烟,来者有期。周瀚光教授在给自己工作“定位”时专门说道:“这部《文集》,其实就是我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与自然科学这两界之间架设的一座桥梁,汇集了我希望连接两界、会通两界、乃至超越两界的尝试和努力。”我想这体现了一位追求真理的学者的崇高理想。事实上,这也是老一辈学者如我的导师冯契先生的理想。而周瀚光教授工作的意义,就是让我们看到了朝着这个理想或目标的一步一步坚实足迹。我相信,通过一代代学人薪火相传的不懈努力,一定会越来越多的学人认识到中国古代哲学与科学或知识的密切关系!而那一天,定将会是中国哲学自身认识与反省取得质的飞跃的日子!让我们期盼这个日子早些到来!